

ZHONGGUO NONGYE
DUIWAI ZHIJIE TOUZI YANJIU

陈 伟◎著

中国农业 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陈 伟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陈伟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109-20671-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农业投资—对外投资—
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32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196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策划编辑 赵 刚

文字编辑 张 岩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52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是以下项目的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农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基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编号：12YJA790011）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国际金融危机下广东农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编号：2012WYXM_0034）

本书出版得到以下项目（单位）的资助：

广东海洋大学农业经济管理重点学科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海洋大学文科类学科建设专项扶持经费

序 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决定了中国农业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还要积极地“走出去”；粮食安全日益严峻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农业“走出去”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利用海外农业资源和海外市场已成为中国加强自身粮食安全不得不研究的新课题。

实际上，粮食安全现已成为许多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预计20年后，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71亿增加到77亿，而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可能性不大，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24）；联合国粮农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研究表明，只有把全球粮食产量提高70%，才能满足人口增加、饮食习惯变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粮食需求的上升，但为了满足世界粮食需求就需要进行长期投资，发展中国家粮食长期投资必须在现有水平上提高50%，根据发展中国家现有的财力状况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6月19日）。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也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问题。据有关方面测算，未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仍将呈刚性增长趋势，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将达到7亿吨左右，但受耕地、水资源的约束和种植效益的影响，小麦、水稻等口粮品种继续增产难度加大，粮食产量预计6亿吨左右，缺口巨大（赵双连，2014）。因此，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2014年六大任务之首，强调必须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粮食

安全的严峻形势要求开辟一条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新途径。农业“走出去”既是农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举措，鉴于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在201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支持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农业生产和进出口合作”。

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农业“走出去”既缺乏经验，又难觅机会，面临诸多困难：（1）面临日益收紧的东道国政策及国际政治舆论压力。（2）面临诸多风险。在陌生的异国环境之中，生产条件、政治、法律等多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会让刚刚“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的成功难度增加。（3）面临成熟市场已基本饱和，新兴市场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困境。（4）面临“走出去”主体选择的难题。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走出去”具有资源优势，但却极易被妖魔化而被捆住手脚；民营企业和个人因受到融资渠道、规模等制约，难以解决全局性问题。（5）企业面临自身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平衡的难题。企业在获取单纯的商业利益与实践国家战略二者衔接之间，也会不时出现矛盾。因此，如何“走出去”是中国农业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外直接投资是农业“走出去”的一种主要模式。所以，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

既能对中国农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培育中国农业跨国公司等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也能对“走出去”战略理论的深化和完善有所贡献。

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第1部分是绪言，对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相关理论和主要文献进行了简要的论述。第2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农业“走出去”最主要的一种模式，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包括：新建（独资、合资）、并购、农业合作示范园区、替代种植、海外研发投资、跨国种植等。第3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本部分就国外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速度、投资主体、区位分布、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第4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本部分运用多元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以及农业生产率是否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检验。第5部分就东道国国家风险对FDI流入影响是否显著进行了检验。本部分基于60个国家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整体、国别和时期差异两个层面，以及国家风险（URISK）、国家风险（CRISK）、制度质量（RQ）三个维度对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否显著地影响FDI流入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6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来源研究。本部分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深入分析后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来源渠道、产生的原因和产生国家风险的主体进行了分析。第7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评价。本部分基于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研究视角，从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国家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误解的论调、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名等方面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

做出间接的评价。第8部分是典型案例剖析。本部分选择了近年来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最大一笔交易：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这一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对收购过程、资金渠道、收购成功的原因、所遭遇的挫折、借鉴意义及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第9部分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本部分从政府、企业、半官方和民间机构三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1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1.2 相关理论及主要文献的简要回顾	7
1.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及主要文献	7
1.2.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相关理论及主要文献	10
1.2.3 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因素的相关理论及主要文献	12
1.2.4 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主要文献	12
1.2.5 文献研究述评	24
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	25
2.1 “走出去”模式类型和演变路径	25
2.1.1 “走出去”模式类型	25
2.1.2 “走出去”模式演变路径	27
2.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	27
2.2.1 新建模式	28
2.2.2 并购模式	29
2.2.3 农业合作示范园区	31
2.2.4 替代种植	36
2.2.5 农业海外研发投资	37
2.2.6 农业跨国种植	38
3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40
3.1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	40
3.2 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形势	43

3.3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47
3.3.1	投资规模与速度	47
3.3.2	投资主体	49
3.4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52
3.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52
3.4.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57
3.5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	61
3.5.1	计量模型的设置	62
3.5.2	回归结果及模型的选择	63
3.5.3	发展阶段的判断	65
4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67
4.1	基于国内视角的影响因素分析	68
4.1.1	影响因素及假设的提出	68
4.1.2	实证分析	71
4.1.3	计量结果分析	77
4.1.4	相应的政策含义	81
4.2	关键因素实证研究	83
4.2.1	主要研究变量	84
4.2.2	研究设计和变量的选取	85
4.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87
4.2.4	研究结论	92
5	东道国国家风险对 FDI 流入影响研究	98
5.1	问题的提出	98
5.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说明	100
5.2.1	变量选取	100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103
5.3	实证检验与分析	105
5.3.1	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105
5.3.2	基于整体视角的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105

5.3.3 基于国别和时期差异的检验	110
5.3.4 东道国国家风险相似性的聚类分析	115
5.3.5 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116
5.3.6 研究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119
6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来源研究	122
6.1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家风险	123
6.2 国家风险的来源渠道	127
6.2.1 与制度相关的政治风险来源渠道	127
6.2.2 与政府管制相关的政策风险来源渠道	127
6.2.3 与文化差异相关的社会风险来源渠道	128
6.2.4 经济风险来源渠道	129
6.2.5 自然灾害风险来源渠道	129
6.3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产生的原因	129
6.3.1 世界各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	130
6.3.2 东道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带来国家风险	130
6.3.3 “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131
6.3.4 在舆论媒体的误导下,对中国农业投资进行妖魔化	132
6.3.5 东道国国内环境的变化	133
6.3.6 对来自中国的农业投资既欢迎又担忧的矛盾心态	133
6.3.7 与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冲突	134
6.3.8 收益分配方案模糊	134
6.3.9 资源环境问题	135
6.3.10 企业自身的原因	136
6.4 可能产生国家风险的主体	136
6.4.1 某些实权人物	136
6.4.2 东道国政府及其他权力部门	137
6.4.3 既得利益集团	137
6.4.4 东道国政党、行业协会、工会、舆论媒体及一些非 政府组织	138
6.4.5 普通民众	138

6.4.6 国际性组织	139
7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评价	143
7.1 国际社会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145
7.1.1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结果	146
7.1.2 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151
7.2 西方国家曲解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调	154
7.2.1 扩张论	155
7.2.2 掠夺资源论	155
7.2.3 破坏环境论	156
7.3 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名——以中非合作为例	156
7.3.1 中国与东道国农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6
7.3.2 中外农业合作是现阶段国际分工的结果	159
7.3.3 在非洲困难时中国出手相助	162
7.3.4 世界各国主流民意欢迎中国的投资	163
8 典型案例剖析：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	169
8.1 关于双汇国际和史密斯菲尔德食品	169
8.2 收购过程回顾	170
8.2.1 收购情况简介	170
8.2.2 收购过程的主要时间节点	172
8.3 收购的资金来源渠道	172
8.4 收购成功的原因	173
8.4.1 美国方面	173
8.4.2 中国方面	174
8.4.3 双汇国际方面	175
8.4.4 史密斯菲尔德方面	176
8.5 收购过程中遭遇的挫折	177
8.6 借鉴意义及启示	181
8.6.1 借鉴意义	181
8.6.2 启示	181

9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85
9.1 政府层面	185
9.1.1 制定农业“走出去”国家层面的战略	185
9.1.2 增强政府的服务与监督功能	186
9.1.3 加强中国农业“走出去”正面效应的宣传力度	187
9.1.4 积极改革和完善对外援助体制	190
9.1.5 培育大型农业跨国企业	190
9.2 企业层面	191
9.2.1 积极开展东道国的调研	191
9.2.2 增强社会责任感, 改善企业形象	191
9.2.3 提高企业国家风险的管控能力	192
9.2.4 借鉴大型国际粮商的经验, 争做粮商	192
9.2.5 重视文化差异	193
9.3 半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层面	193
参考文献	195
附录: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208
后记	262

1 绪 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新形势下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谁能率先成功地“走出去”，谁就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并能从全球经贸福利中获得较大份额；谁能率先成功地“走出去”，谁就能率先突破国内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或制约瓶颈，寻求到更大的发展空间（陈淮，2008）。为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2008）上参与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农业就必须积极大胆地“走出去”，“不能关起门来搞粮食安全”（韩俊，2013），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努力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进而不断增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具体来讲，本书的研究背景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走出去”既是农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愈国际愈强大。正是基于我国农业发展要有更宽的视野、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强的后劲，党和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见表1-1）^①。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农业“走出去”最主要的模式，也是提高粮

^① 除一些会议和文件外，党和政府还积极地通过其他方式鼓励企业“走出去”，如2015年5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访问俄罗斯时，中俄两国签署了同意成立一个2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投资目标为中俄两国农业项目的协议（环球网，<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5/6387146.html>）。

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表 1-1 近年来党和政府重要会议（文件）有关农业“走出去”的表述

时间：2008 年 11 月 13 日；会议（文件）：《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有关论述：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

时间：2010 年 10 月 18 日；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论述：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发展海外工程承包，扩大农业国际合作

时间：2012 年 11 月 8 日；会议（文件）：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有关论述：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时间：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有关论述：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时间：2013 年 11 月 12 日；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论述：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时间：2015 年 2 月 2 日；会议（文件）：2015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有关论述：健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抓紧制定农业对外合作规划。创新农业对外合作模式，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运、贸易等环节合作，支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开发

时间：2015 年 3 月 5 日；会议（文件）：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论述：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让中国企业走得远、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

（2）中国粮价与国际市场倒挂，粮食库存规模日增。目前，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存在巨大价差，如 2014 年 4 月 8 日，美国 2 号黄玉米到中国口岸完税后总成本约为 1 570 元/吨，比临储玉米成交均价低近千元，3 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 810 元、900 元和 700 元左右；大豆的价差更高，达 1 600 元/吨。巨大差价下，中国进口大增。2014 年，中国进口谷物（即国际统计下的粮食口径）1 951 万吨，同比增长 33.8%，创历史新高。据农业部测算，2014 年，中国约有 0.5 亿吨粮食属于非必需进口（汪苏，2015），这也使得国际社会的中国“粮食威胁论”甚嚣尘上，而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十一连增”的光环下，三大主粮库存高企。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 2015 年“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一些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突出的是玉米，玉米和水稻出现高产

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的现象。如果直接在国外生产粮食,无疑会降低成本。

(3) 国际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以“ABCD”(即: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集团(Bunge)、嘉吉(Cargill)以及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简称为“ABCD”)为代表的国际粮商、以孟山都和杜邦先锋为首在华的35家国际种子巨头,以及以高盛、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和巴克莱银行指数基金为代表的粮食投机商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方式迅速地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和种子的生产、收购、批发、流通、加工、贸易、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加快垂直整合与联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农业经营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邓家琼,2010),中国农业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农业自然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农业海外投资还主要是农作物种植,海外继续做“农民”,而不是做“粮商”,未控制粮源(程国强,2013),这不仅易被扣上了“新殖民者”的帽子,而且粮食进口价格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大型国际粮商手中。因此,通过农业“走出去”最终造就一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已是摆在中国农业面前不可避免的问题。

(4) 中国粮食安全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进口角度看,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08)。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进口的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三种主要粮食突破1000万吨大关,2014年谷物净进口达1874.7万吨,同比增38%。由于国际粮食市场和价格深受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影响而动荡多变,导致粮食带有很强的战略特征,在粮食贸易的过程中衍生出诸如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引发部分国家及学者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等问题,使我国粮食供应的安全性 with 稳定性受到威胁,贸易不再是我国获取粮食稳定、安全的方式;从出口角度看,由于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过分依赖农产品出口这种单一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显得十分迫切。

(5) 中国农业“走出去”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家风险。由于世界各国

农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以及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粮食需求的增加和气候的影响导致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业跨国种植无论对各国政府、农业组织和大宗商品交易商,还是对机构投资者都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由于粮食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与政治相关程度极高,这也引起各国学者和政治人物的高度关注。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许多国家政府、金融投资者和企业积极寻求投资海外农田,纷纷到海外租(买)地种粮。这些投资国主要来自于东亚和南亚国家(韩国、日本、印度、中国等)、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以及欧盟和美国等国的私人投资者,日本与韩国是其中的代表。根据农耕地监督组织“土地环境计划”(Land Matrix Project)的统计,在2000—2010年,大约2.3亿公顷土地被收购或长期租用。

中国农业国际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农业海外投资主体既缺乏经验,又难觅机会,在陌生的异国环境之中,生产条件、法律、政治等多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会让初出茅庐的中国海外农业战略及其执行者的成功难度倍增;作为国际投资的后起者,在激烈的竞争下,中国农业企业被迫进入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承受着政局动荡、内战、政策不稳定、海外财产与人身安全威胁等各类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案例的增多,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外农业投资的热议。中国农业企业面临除农地出租(售)国日益收紧的政策外,一些政客和媒体将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个案无限放大并加以政治化,被炒作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面临巨大的国际政治舆论压力。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农业“走出去”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将日益复杂,面临各种复杂的风险,特别是国家风险。

(6)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抵御国家风险的能力较弱。近年来,中国农业“走出去”发展迅速,涉足农业“走出去”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经营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总体来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还比较小,抵御国家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很多企业由于缺乏对东道国农业领域投资环境及引资政策的了解,各类风险已成为企业成功实现“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成为制约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引发的各种教训令人深思。为保证“走出去”推进工作的秩序和效益,需要加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